

论意义的双向性与贯通：一个符号现象学观点

□ 彭 佳

摘 要:意义是一个双向的构造物,并且,意义贯通了文化与自然的领域。乌克斯库尔的符号意义理论将意义研究延伸到了生物学范畴,而在当代符号学的奠基者皮尔斯和维尔比夫人的意义三分式中,感知都被视为第一性的意义,生物符号学的意义研究由此展开。在意义的三个阶段,尤其是第一阶段,就已经具有了双向建构的性质;这种双向性出现在生物符号意义和文化符号意义的开端。因此,将意义视为双向构造物,是将符号现象学拓展至生物领域的一个重要起点,并且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种种可能。

关键词:意义;双向性;贯通;符号现象学;生物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5)10-0112-08

“符号学研究全部与意义相关的活动……符号学即意义学”,^[1]这一关于符号学研究对象的总结,在现今的符号学界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同。符号学对意义的关注其来有自:符号学的奠基者之一索绪尔就认为,语言符号学(semiology)考察的是语言符号及其意义的关系^[2];皮尔斯在建立符号学(semiotics)基础的早期(当时他将符号学称为逻辑学)指出,在符号学研究的三个分支中,“思辨语法学(speculative grammar)”是一种“有关符号——无论它们是像似符 (icons), 指示符 (indices) 还是规约符 (symbols)——的性质与意义的一般理论”^[3],之后,他提出了符号意义的三项式,并由此奠定了当代符号学的理论基础。符号学的另一位奠基人维尔比夫人 (Lady Victoria Welby), 则将符号学称之为“表意学”(significance), 认为表意学就是研究三重维度上的意义认知,即“符号、感官和价值之间的关系”。^[4]百余

年之后的今天,在符号学的重镇塔尔图,洛特曼的继承者们声称,符号学研究的是意义产生机制问题^[5];而约翰·迪利(John Deely)也说过,对生存的“意义界域”(meaningful sphere)的探寻,是符号学得以向生命领域突破的基础;^[6]在著名的《对意义的追寻:符号学理论与实践指南》(*The Quest for Meaning: A Guide to Semiotic Theory and Practice*)中,加拿大杰出的符号学家马塞尔·达内西(Marcel Danesi)则直截了当地把符号学称为“意义的科学”(Science of meaning)^[7]。由是观之,意义问题,始终是符号学的核心问题所在:那么,什么是意义?意义的过程有哪几步?尤其是在生物符号学(biosemitics)日益兴起的今天,意义理论需要取得什么样的进展,才有助于符号学研究向更深广的领域推进?尤其是,意义如何被符号学研究作为贯通文化与自然的连续体?本文试图以意义的双向性为起点,在符号现象学的视域中,对这几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重大社科基金“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的阶段性成果,并受西南民族大学2014年度中央高校青年教师基金(2014SZYQN31)资助。

作者简介:彭佳(1980-),女,汉族,四川泸州人,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生态符号学、民族符号学、少数民族文学。

个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

一、意义作为双向的构筑

对于什么是意义,批评家们一直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早在1923年出版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中,奥格登(C.K.Ogden)和瑞恰慈(I. A. Richards)就列出了十六项对意义的定义:例如,意义可以被视为词语固有的属性,可以被视为行为、意图和情感的伴随物,等等。^[8]对于这些定义,奥格登和瑞恰慈并没有判定孰优孰劣,而是将它们进行了综合性的论述。的确,在不同的语境和领域中,“意义的意义”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很难以简单的正误判断一言蔽之。譬如,认知心理学家约翰逊-莱尔德(Johnson-Laird)认为,意义是一种心智模式(Mental Model),即思维的产物。通过对推理和认知过程的反向分解,他推导出了语义生成的心智模式。^[9]对此持反对观点的情境语义学家,如乔恩·巴威斯(Jon Barwise)和约翰·佩里(John Perry),则将意义视为处于变动中的符号与世界关系的对应性。^[10]各家的意义理论似乎都能自圆其说,对于如何定义意义,学界一直以来都没有定论。

尽管意义的意义无法定于一尊,但是,意义关涉着现象,并且需要用符号来进行表达,这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最早在意义理论中指出现象之重要性的批评家,应当是哥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他对此曾举出一个妙例,也就是人们对“第四小的行星,第二大的行星”的称谓。这颗行星既可称为金星,也可称为晨星。这两个指称所指的都是同一对象,但意义却各有侧重:金星是一种直接的指称方式(尽管它也有隐含意义,因为Venus一词也指称象征着爱欲和美的女神维纳斯),而晨星一词却指明了这样的事实:这颗星只有在日出之前才能被看见。由此可见,对符号的认识是包含着对现象意义的认识的,同一对象的不同现象,可以被表现为意义不同的符号。^[11]因此,对象如何符号化,也就是如何进行意义生产,这个问题,是现象学和符号学的联结之处。

由胡塞尔开启的构成性现象学传统,将对现象的感知作为意义活动的第一步。胡塞尔认为,对象和意识主体在感知的最低层面上的相遇并

非对象和白板(tabula rasa)的相遇。他在《经验与判断》中写到:“在较低或较高阶段的自我主动性这种最广义上的判断活动不可与那种被动的信念、即休谟和追随他的实证主义假定为意识白板上的材料的信念相混淆。”^[12]“只有对象化的、认识的主动性,只有低级和高级阶段的我性主动性,而不是单纯被动的意见,才会创造出认识对象和判断对象。”^[13]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意识主体对对象的最初感知也是具有“自我主动性”的,它不是对象单方面的、之于意识的投射,而是意识对于意义的主动寻求,这种主动寻求意义对象的、自我明证的起点,被赵毅衡称为“形式直观”,也就是意义过程之第一性的第一步。

形式直观是意义过程的起点,然而,和胡塞尔的观点所不同的是,赵毅衡认为,整个意义过程从第一步开始,就是双向构成的,而非单向的意义寻求。在《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起点》一文中,他指出,“直观的动力,是主体意识的意向性,意向性形成的这种‘获义意向活动’(noesis)投向饰物,把事物构筑成‘获义意向对象’(noema)以期获得意义,而该事物提供的符号形式感知,回应此意向,形成对意向的给予,意义就出现在这个主客体互动中。”^[14]形式直观,也就是感知的启动,它本身就是意向性的,是对对象的相关观相、或者说相关性质的寻找,而意义对象的相关品质所反馈的信息,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感觉,并进一步形成理解。在形式直观的阶段,对象还未形成意义,它仅仅是一种相关的质,但形式直观必须启动对这种质的感知,而对象的相关质则反过来被意识获取,进行第一性的第二步,即形式还原,以构建出相关的意义。由此,赵毅衡提出了一个关于意义的新定义:“意义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双向的构成物:意义是意识的获义活动从对象中构筑出来的,并能反过来帮助意识主体存在于世的关联性”。^[15]

将意义定义为双向的构成物,事实上,这一看法和生物符号学对意义的定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乌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ull)的环境界理论就认为,所有的生命系统都能够产生意义,而且,也只有生命系统才能产生意义。每个物种所特有的环境界(Umwelt)是一个意义世界,这个

意义世界是在生命主体和它所在的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中形成的。在此基础上,兹拉特夫(Jordan Zlatev)提出,“意义是生命体与其物质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它是由环境之于生命体的价值而决定的。”^[16]

这个定义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意义活动的主体是生命体,这和生物符号学的基本观点,即,只有生命系统才能够产生意义,是相一致的。第二,意义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既然是关系,它就一定是双方的,而非单方面的;并且,意义既非主体性的,也不是对象性的,而是两者关系的相互构筑。在生物符号学对意义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意义双向性的肯定。生命体的意义世界,即环境界,它并非一个完全的主体世界,而是主体和环境互动的结果。第三,意义之于生命体可以是两种类型的:生理性和文化性的。意义作为一种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文化范畴之内,而是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符号活动之中;也就是说,意义是贯通于文化和自然领域的,这对传统西方哲学对文化与自然的两分是一个挑战。第四,意义是由环境之于生命体的价值而决定的,在生物层面上,这也就意味着,生命体自己的生理结构预先地决定了对对象的感知如何启动(形式直观的方式),并感受到相关的质(得以形式还原),得到解释或做出反应;对于不同的生命体而言,同一个环境中能够被感知的获义对象不同,对同一获义对象的反应、认知和解释也不尽相同。第五,在文化层面上,意义的基础是“(主要)由符号过程的规约性的价值系统”。^[17]由此可见,意义主体具有的生理结构或文化价值体系,是先验地存在于意义过程之前的,它驱动意义主体开启独特的感知模式,主动地去寻找意义对象。反过来,获义对象被赋予的意义也是意义主体存在的条件:在生物学层面上,对获义对象的反应或辨认、解释,关系到意义主体的生存和延续(如植物对光的寻获,动物对危险或配偶的判定等);在文化层面上,意义主体的社会性和文化经验累积,也是通过获义对象的意义反馈来进行确认的。意义的这种双向构成,无疑是与意义主体的意向性相关的:只有当主体具有意向性的时候,才能驱使自身开启整个意义活动。

二、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理论:生命体的意义世界及其符号感知的双向性

作为生物符号学的奠基者,乌克斯库尔最重要的符号学理论,就是他所提出的“环境界”(Umwelt)理论。所谓“环境界”,就是生命体“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拥有的”^[18]主体性的意义世界,它是生命体的感知所覆盖、它自身所创造的世界,是基于符号关系而建立的。由于物种之间的感知器官、方式和范畴不尽相同,在同一个实际世界中,不同的生命体建造出了不同的环境界;也就是说,它们拥有彼此各异的意义世界。从这里可以看出,乌克斯库尔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初期,就已经考虑到了意义问题;而意义问题正好是符号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1920年,在他最重要的著作《理论生物学》一书中,乌克斯库尔提出,不同物种的生物有着类似于康德哲学所认为的、内在的意义“先验图示”(Schema),他将其称之为“生命体的计划”(plan of organism, Planmässigkeit):正是这种计划,预设了生命体对世界的不同感知,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环境界。这一建立在生命机体计划上的环境界是经由生命体的功能圈(functional cycle, Funktionskreis)机制实现的,它可以分为感知世界(perceptual world, Merkwelt)和行为世界(operational world, Wirkwelt)。

在乌克斯库尔看来,生命体要辨认出外部环境中的对象,首先要经过信号感受器(Rezeptor Merkmalträger)的符码转换,也就是,将对象转化为生命体的内部世界(Innerwelt)可以辨认的信息符号。这个符号进入了生命体的感知世界,由它的感知器官(Merkorgan)所感知,并且传达给了行为器官(Wirkorgan),进入了行为世界。在行为世界中,这一对象的符号由行为效应器(Wirkmalträger Effektor)进行了第二次符码转换,从而对对象实施行为。第一次的符号解释行为是辨认性的,感知器官由此做出了判断,并将这条信息(如,异常的超声波)传达给了行为器官。行为器官立即启动了行为效应器,对这一符号信息进行翻译(这种超声波意味着天敌——比如蝙蝠——的出现,必须马上逃跑),这是第二次的符号解释行为,它是驱动式的。当生命体完成了这一意义

的解释和行为之后,它逃离了危险,并且完成了对象意义的第一次累积,这个完整的功能圈循环得以建立。从此之后,这种意义传递可以在它的功能圈中进行不断的重复和加深,而蝙蝠这一对象变得可以辨认,成为了它的环境界,也就是意义世界的一部分。正因为这种预设的有机体设计,也就是不同物种的感知器官和行为器官的特定性,乌克斯库尔指出,生命体的环境界是各不相同的,它们就好像是由各种无形的关系所组成的透明的罩子,决定并且构成了经验对象。

在这里必须指出,乌克斯库尔在提出环境界理论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说相当前沿的观点,即感知就已经是符号。他将生命体对对象相关特征的感知称作感知符号(Merkmal),把行为效应器发出的、驱动生命体做出反应的符号称作效应符号或行为符号(Wirkmal);这两个词的词根-mal在德文里表示某种标记的行为或结果,而Merk-来自于德文merken,它的意义是“注意”;而爱沙尼亚语的märk源自于古老的日耳曼语,其意义是“符号”。因此,Merkmal一词的含义是“被注意到或感知到的符号。”而Wirk-则源自于德文单词wirken,其意义是“对某物产生影响或效果”;因此,Wirkmal被理解为“效应符号”或者是“行为符号”。^[19]乌克斯库尔明确地将生物信号称之为符号,这个观点的确具有很大的超前性。

符号是用来承载意义的,并且,符号和现象有关:在乌克斯库尔的理论中,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蝙蝠能够感知到空气中不同波段的超声波,是因为蝙蝠作为意义主体,一直在寻求意义对象:这个意义对象或者是它需要捕食的猎物,或者是它需要躲避的天敌,或者是它需要寻求的配偶。这种符号意义关系,是由蝙蝠预先的身体构造和认知先验图示所决定的,它之所以呈现为蝙蝠的意义世界中能够被它感知的现象,一是因为意义主体持续的意义寻求,二是因为获义对象本身品质之于主体意识的投射。蝙蝠所感受到的是不同意义对象所产生的不同波段的超声波,这种与对象相关的品质就形成了它的感知符号,在蝙蝠的环境界、即意义世界中生产出意义。同样的物,如蚊子,对于作为意义主体的人是避之不及的对象,对于蝙蝠却是必须寻求的对象;并且,人主要是依靠视觉和听觉、触觉获取对这

一对象的感知,而蝙蝠依靠的却完全是听觉——意义产生的双向性可见一斑。主体的意向性与对象相关品质的反馈,在这个双向的关系中,意义得以建立,意义世界由此形成。

乌克斯库尔将生物体的符号世界视为意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康德的影响。在《理论生物学》一书中,他写道:“所有的现实都是主体性的表象。……当我们承认,对象是由于主体的建构而出现的,我们就脚踏着坚实而古老的基础,这一基础是康德建立的,其上可以建立整个自然科学的大厦。康德将主体和对象相对立,发现了心灵如何构建出对象的基本原则。”^[20]如同人类需要框架才能感知世界、获得外界经验一样,生命体也必须通过自身的功能圈对相关的符号对象进行感知,才能建立自身的环境界。在当时的生物学界,人们普遍认为,其他生命体和外界的关系只是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而乌克斯库尔的这种理论范式成功地“延伸了康德对生物学的概念。”^[21]康德对乌氏的影响主要表现:生命体作为环境界的主体,具有先验性的意义图示,因此,生命体是一个“选择性的解释者”(selective interpreter),它的行为并非对外界刺激的机械反应。

本文可以用虱子捕食的例子,来解释生命体这个“选择性的解释者”如何与环境中与自身相关的对象进行联接,从而生产出意义的过程。首先,虱子要爬上树梢,才能有机会落在从树下经过的哺乳动物身上。虱子没有视觉,但它的皮肤具有感光能力,能够靠这种趋光性爬上树梢;在这里,虱子对光的感知经过行为效应器的转换,形成了一个指示符号,“朝某处爬可能会有食物”,而它也遵循了这一符号的指示。它能够辨认出靠近的哺乳动物,是因其特有的嗅觉器官能够探测出哺乳动物汗液中的酸性物质。这个符号之于虱子的意义在于,“有食物对象靠了过来”,并再次转换为一个指示符号,“有食物在下方”,驱使它往下跳跃。当虱子落到它的捕食对象身上时,由于其自身具有的温度感应器官,它可以迅速地通过对哺乳动物体表温度分布的判断,找到裸露的皮肤在哪里。此时,虱子的感知又一次被转换为另一个指示符号,“在某个方向有食物”;根据这一指示,虱子能够迅捷地爬到裸露的皮肤

之上,并进行吸血行为。

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虱子能够完成对食物对象的辨认,并对其施予行为,依靠的是一系列从感知到的像似符号转化而来的指示符号,虱子的符号世界、或者说意义世界的空间性,是一个先验性的范畴,它是依靠虱子先天的身体感知构造形成的。此外,这些指示符号并不全都是即刻的、直接的,而是一个完整的意义链。由感光器官感知到的指示符号,“朝某处爬可能会有食物”,指导了虱子的行为;但此时并不一定有食物对象进入虱子的环境界;如前文所言,虱子有时甚至需要等待数年时间,才有食物对象靠近。因此,虱子的符号世界或者说意义世界也是时间性的,它的行为具有时间预期。对于生命体的时间感,乌克斯库尔指出,生命体对时间的特定感知合并了生命体内部和外部的进程,在不同物种的环境界之内,同样的时间跨度包含着具有不同数量刻度的时间段。生命体在不同情况下感知到的时间快慢各异,这也是由其先天的感知器官构造而决定的;这种主观的感知时间,保证了生命体可以对外界符号进行及时的解读和反应,从而完成预定的行为。

既然作为主体的生命体是具有选择性的,那么,绝对的客体或者说对象就是不存在的。如马尔克斯(Solomon Marcus)所说,“乌克斯库尔称之为中性客体的世界是很不稳定的,其间的中性客体可能会成为意义对象。有可能两个不同的生命体注意到同一个中性的客体,试图将其转化为一个意义对象。也有可能生命体A试图将另一个生命体B转化为意义对象,生命体B则把第三个生命体C转化为另一个意义对象,等等。”^[22]也就是说,在环境界中的对象绝非自足的存在,它的意义依靠的是主体的输入;当中性客体成为意义对象时,它就进入了主体的视域,进入了一个意义框架。主体的这种意义框架,就是康德式的先验图示,它调节着先在的范畴和现象之间的关系。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意义必须要从主客体关系中产生,主体无法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对象所不具有的品质,从而创造出与之无关的符号:符号意义的生产永远是在双向的对话之中,这也是以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 Ponzio)、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为代表的符号学对话学派和伦理

符号学派所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23]

对乌克斯库尔这种康德式的生物符号学观,简瑞碧将其称为“有计划的生物学”(planned biology),她认为,正如康德的“图示”规定并限制了人类对世界的再现一样,乌克斯库尔提出的功能圈和“身体计划”概念,规定并限制了生命主体对世界的再现。但另一方面,她也指出,康德的“图示”是形而上的、超验的,并非人类思维的基本神经结构,而环境界理论,则涉及到生命体的具体生理结构。^[24]

简碧瑞的这一看法和斯坦菲尔德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将乌克斯库尔的理论形容为“新康德式符号学”(neo-Kantian semiotics):除乌氏之外,这一阵营中的主要人物还包括皮尔斯和卡西尔(Ernst Cassirer)等符号学大师。^[25]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在论及符号意义理论时,采取的都是和康德式的图示观相似的视角,认为符号主体的思维/认知框架,为对象意义的输入提供了依据。尽管卡西尔本人认为符号仅仅是人类所独有的,但他将符号形式理解为直觉和结构形式之间的联接,这是和康德的先验图示观类似之处。皮尔斯认为作为符号主体的“心灵”(mind)或“准心灵”(quasi-mind)是解释项的生产者,符号活动的三性范畴分别和符号主体对对象的感知、判断和理解相对应,这也就意味着,是符号主体为对象认知提供了一个意义框架,从而使对象的品质能够被辨认、判断和解释,在相互关系中生产出意义。由于皮尔斯的符号观是包含了从“准心灵”到“心灵”为主体的符号意义世界^[26],符号意义研究的领域也就从生物领域延伸至人类的语言文化界域,成为了一个连贯的整体。

三、皮尔斯与维尔比夫人的意义三分式:第一性的双向性与符号意义活动的贯通

皮尔斯将意义活动界定为三分的过程,从第一性的感知,到第二性的认知、判断,再到第三性的理解与筹划,意义逐渐得到扩展和加深:“符号的‘第一性’即‘显现性’,是‘首先的,短暂的’,例如汽笛的尖叫;当它成为要求接受者解释感知,就获得了‘第二性’,成为坚实的,外在的,能够表达意义的符号;然后出现的是‘第三性’。”^[27]而这个三分的过程,分别属于像似性(iconicity)、指示

性(indexicality)和规约性(conventionality)的范畴。尽管皮塔里宁(Ahti-Veikko Pietarinen)批评皮尔斯的普遍三分式可能太过武断,“会在不存在三分关系的地方看到三分式”^[28];但符号意义过程的三分已经是被普遍承认的模式,故此,本文将将其作为基本的意义过程模式来进行讨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符号意义活动的双向性讨论仅以最低层面的意义活动,即第一性(像似性)的起点阶段为限。

对于第一性,皮尔斯如此说,“……在现象中,存在着感觉的某些质……那种纯粹的品质,或本性,并非像看见一个红色的物体那样,它自身不是一个时间,仅仅是一种‘可能’。”^[29]在这里,皮尔斯首先强调的是符号对象它自身所具有的品质,它的“实在的本性”,还没有被主体的意识所感受、所实在化;它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可能存在”(may-being)。此时意义并没有产生,只是物的多元观相的假定集合已然存在。

接着皮尔斯说,“所谓‘感觉’,我是指某种意识中的一个实例,而这种意识既不包含分析、比较或者任何过程,也不存在于任何可以使一段意识区别于另一段意识的行为之中(即它不存在于整个行为中,也不存在于行为的一部分之中)。这种实例具有自己的实在品质,并且无论这种品质是如何产生的,该品质都不取决于任何其他东西,它自身就是这种品质的全部。”^[30]在这里,皮尔斯并不是说感觉只和对象的品质相关,而和意识无关:他说“该品质不取决于其他的任何东西”,是想将主体对符号的感受和对符号的判断、分类相区分,从而将符号意义活动的第一性突显出来。为了突出这一点,他紧接着写道,“感觉只是一种直接意识的品质”^[31]。这种“直接意识”,就是符号主体的意义寻求,也就是其意向性:由此可以看到,皮尔斯在这里强调的是,主体和对象之间对品质之相关性的寻找,以及相关性的被获取,而非主体的意识与对象之间的相似或比较关系。这一步所对应的,就是乌克斯库尔所说的“感知符号”。在意义活动的第一性中,双向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意义过程的第二性,即认知、经验、判断:“我们能感知到那些带到我们面前的对象;但是,我们特别经验到的那种东西(‘经验’这个词更适用

于这类事物)却是一个事件……形成所必要的那种区别(discrimination)。”^[32]区别,就需要意义主体将对象和其他对象相比较,需要以记忆作为意识的基础。事实上,区别或者说范畴化,是一种“指出”对象所属范围的认知行为;这个符号过程必定是建立在第一性之上,即对相关性质的感知之上的。乌克斯库尔所说的“行为符号”,就属于这个范畴。

意义过程的第三性,是“那种通过把某种品质给予未来的反作用力而为其所是的东西”。这个步骤是第二性的后续,也就是在判断的基础上,根据法则所做出的对符号的解释。皮尔斯之所以说它要“给予未来的反作用力”,也就是说,它作为法则,对将来的同类型符号还将继续起到作用,因此它是规约性的,法则性的。意义过程从第一性到第三性,贯通了从生物的感知、反应到人类的语言文化活动,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从生物符号学的层面而言,意义之三分过程的层层推进,也是生命界域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类的意义获取能力的叠加,这就印证了生物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整个意义系统是渐进的层级式体系,意义过程的渐次展开,与生命之“自然阶梯”的累进是一致的。这正好也和皮尔斯的进化观点可以彼此呼应:他将宇宙的进化法则分为“偶然主义”、“机械主义”和“创造主义”,^[33]这三种类型的意义生产,和生物的渐进发展也有层次上的对应性。

无独有偶,在《何为意义》(What Is Meaning?)一书中,与皮尔斯同时代的符号学家维尔比夫人,也提出了意义三元体的概念,她将整个意义体分为“感觉”(the sense)、“意义”(the meaning)和“意味”(the significance)三步^[34]。在维尔比夫人看来,这三者的关涉各有不同:“和感觉彼此相关的,‘倾向’(intention)、“意指”(signification)和‘对环境的有机回应’(organic response to an environment);和意义彼此相关的,‘意图’(intention)和‘意图传达的特定感觉’(the specific sense it is intended to convey);以及和意味彼此相关的,‘理想值’(ideal worth)、“本质兴趣’(essential interest)和‘理想价值’(ideal value)。”^[35]她将自己的思想和东方哲学,尤其是《吠檀多精髓》中的意义层次三分相联系,认为这意义三元

体的每个部分分别对应的是“明确的”、“表明的”和“暗示的”层面：“这种三分法有多种形式，也许其中最显著的一种来自东方：（属于一个词的）意义是三方面的，即：明确的、表明的和暗示的。明确的意义是由外延传递给理解的意义；表明的意义则是由其暗示内容所传递的。”^[36]对此，施密茨（High Walter Schmitz）认为，感觉是本能性的，意义是意志性的，而意味着是道德性的。^[37]这三个层次由低及高，解释了意义如何从初始感觉上升至理性层面的。

和皮尔斯的观点相似的是，维尔比夫人的意义三分式也成为了生物符号学意义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皮尔斯和维尔比夫人观点的相似性可能源于他们彼此之间的通信讨论，其中特别明显的是，他们对符号的定义都是宽松式的：例如，皮尔斯在1977年写给维尔比夫人的信中，就是使用“主体”（subject）和“对象”（object）来讨论符号形式与交流，而不像索绪尔学派的符号学家们那样，讨论的仅是“社会符号的生命。”^[38]这种符号意义观的宽泛性给当代的符号学家留下了很大的再解释和发展余地。比如生物符号学家认为，维尔比夫人所说的，“感觉”关涉的是“对环境的有机回应”，这使得意义过程的第一性可以扩展至有机体（organism），因为只要是生命，就可以做出有机回应，也就是进行对某种相关性质的感知；而第二性所关涉的“意图传达的特定感觉”，则和动物认知中的范畴化休戚相关，因为特定化其实就是范畴化的过程。至少，在动物符号学的研究中，这种看法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而人类的意义活动是理性的、文化的、道德性的，具有规约的性质，这也和皮尔斯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有趣的是，尽管维尔比夫人不是生物学家，她对意义在生物与人类活动领域的贯通和精神进化之间的关系却怀有强烈的兴趣。在与生物学家乔治·J·罗曼尼斯（George J. Romanes）的通信中，她从不同层级的符号活动的角度描述了动物世界的思想过程，而且指出了它们与人类符号活动的相似之处和区别。她指出，“原始人类从一开始就对环境做出回应，而不是像原生动物的原质时代那样，继承一种内在的做出正确反应或关联的倾向。”^[39]在这里可以看到，不管是人类的回应还是原生动物的回应，他们对环境都有回应性的行

为，这个意义过程是一个互动。并且，维尔比用“回应”（response）一词来描述人类主体对于环境对象的行为，而不是用机械的“反应”（reaction）和“回馈”（correspondence），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意义解释行为并非基因式的、遗传性的，而是带有个体自我意识的。在她看来，这种意义层次的递增，是从前意识、意识到理性的发展序列，这也就使她的研究有了向广泛的生命领域推进的可能：“整个动物‘王国’（如果不包含植物的话）共享着感知世界……意义感知的出现——最高种类的感知——标志的新的开始：它开启了独特的人类时代。”^[40]尽管维尔比对植物界能否纳入意义世界的研究对象还有所保留（在她的研究中，她将第一性的意义和宇宙的意义相联系，但明确提出的例子却是动物的意义行为），但她已经承认动物、甚至是低级的原生动物的意义活动——而西比奥克（T. A. Sebeok）的动物符号学理论得以形成，已经是在她的著作出版的近百年之后！我们不得不说，正如皮尔斯一样，维尔比夫人的符号意义理论为广义符号学的建立，早早地立下了理论根基。

四、结论

将意义作为双向的建构物，不管是对人类文化意义活动的研究，还是对生物符号意义的探索，这都是一个合适的起点，因为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关系，不可能在一元物中产生。意义的双向性贯通了从生物符号活动到人类符号活动的整个领域，呈现出当代符号学连续论的显著特点，值得进一步讨论和研究。当然，要将生物符号学和意义研究、尤其是现象学相结合，仍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我们进行重新思考，如生物是否具有意向性，生物环境界之间的差别等等；但是，至少这个以意义双向性为基础的起点，具有跨越领域的普适性，并为将来的研究指出了可能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 [2]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p.2.
- [3]C.S. 皮尔斯著，赵星植译，《皮尔斯：论符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 [4]宋文、张云：《探求他者：维多利亚·维尔比的表意

学浅析》，《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7期，第23页。

[5]卡莱维·库尔、彭佳：《新塔尔图研究：继承、融合与推进—卡莱维·库尔教授访谈》，《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6期，第146页。

[6]John Deely, "Umwelt", *Semiotica*, 2001, 134 (1/4), p.130.

[7]Marcel Danesi, *The Quest for Meaning: A Guide to Semiotic Theory and Practice*, 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 p.13.

[8]C.K. Ogden & I.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New York: Harcourt, Grace Janovich, 1989, p.20.

[9]P.N.Johnson-Laird, "Mental Modes in Cognitive Science", *Cognitive Science*, 1980(4), pp.84-89.

[10]Jon Barwise & John Perry, "Shifting Situations and Shaken Attitudes: An Interview with Barwise and Perry",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985, 8(1), pp.105-161.

[11]See Marcel Danesi, *The Quest for Meaning: A Guide to Semiotic Theory and Practice*, 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 p. 13.

[12][13]埃德蒙德·胡塞尔著，邓晓芒、张廷国译：《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4页。

[14]赵毅衡：《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第19页。

[15]赵毅衡：《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第24页。

[16]Jordan Zlatev, "Meaning=Lifé (+Culture): An Outline of A Unified Biocultural Theory of Meaning",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2002, 4(2), p. 258.

[17]Jordan Zlatev, "Meaning=Lifé (+Culture): An Outline of A Unified Biocultural Theory of Meaning",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2002, 4(2), p.261.

[18]米哈伊·洛特曼著，汤黎译，《主体世界与符号域》，《符号与传媒》，2013年，第6期，第152页。

[19]Tuomo Jamsa, "Javob von Uexkull's theory of sign and meaning from a philosophical, semiotic, and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Semiotica*, 2001, 134(1/4), p. 490.

[20]Jacob von Uexkull, *Theoretical Biology*, London: Kegan Paul, 1926, p.xv.

21 John Deely, *Basics of Semiotics*, 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57.

[22]Solomon Marcus, "Uexkull's concept of Umwelt", *Semiotica* 134-1/4(2001), p.205

[23]详见Frank Nuessel, "Semioethics: An Introduction", 《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9期，第68-77页。

[24]简瑞碧：《乌也斯库尔生命符号学之历史沿革》，台北：台湾大学，2005年，第59-64页。

[25]See Frederik Stjernfelt, *The Heaven of Rationality*, 1997, Copenhagen: Gyldendal.

[26]详见彭佳：《符号的底线：始于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讨论》，《西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61-66页。

[27]赵毅衡：《回到皮尔斯》，《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7期，第7页。

[28]Ahti-Veikko Pietarinen, Dai Weiwei, Zhao Xingzhi, "Extensions of Charles S. Peirce: An Interview with Anti-Veikko Pietarinen", 《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9期，第49页。

[29][30]C.S. 皮尔斯著，赵星植译：《皮尔斯：论符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31]C.S. 皮尔斯著，赵星植译：《皮尔斯：论符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32]C.S. 皮尔斯著，赵星植译：《皮尔斯：论符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33]参见苏珊·佩特瑞丽、奥古斯托·庞其欧著，王永祥、彭佳、余红兵译：《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敞开网络的解释路径》，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34]Victoria Welby, *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2.

[35]Victoria Welby, *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6.

[36]Victoria Welby, *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46.

[37]苏珊·佩特瑞丽、奥古斯托·庞其欧著，王永祥、彭佳、余红兵译：《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敞开网络的解释路径》，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38]James Jakob Lizka, "Some Reflections on Peirce's Semiotic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9期，第15页。

[39]Victoria Welby, "An Apparent Paradox in Mental 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891, May, pp.319.

[40]Victoria Welby, *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28.

(作者单位：1.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4; 2.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

(责任编辑：陈建宁)